

我参与策划林风眠“批斗会”(下)

◆ 胡振郎 口述
吉岭 魏松岩 撰稿

我们接着又简单谈了几句。我主要表达两点意思,情绪上安慰林先生,希望他更坚强,能度过眼前的艰难时光。另外,就是告诉他一些沈柔坚的具体情况,让他看到希望。我深知第二点对他更重要,林先生在上海孤苦无依,以前沈柔坚是他的保护神,很照顾他。现在他身处困境,唯一可依靠的也只有沈柔坚。心存希望,有了盼头,林先生在狱中才能把接下来的生活过下去。

果然,林先生非常关注沈柔坚的情况,听得特别仔细,问了好几个问题。之后他谈起自己的狱中生活。他说:“小胡,你看,我连裤带都没有,他们拿走了。”边说边作势掀起衣襟给我看。“我一天只能吃到两餐饭。他们一次次找我,提审我,还打我……”说着说着,林先生两行泪泪又滚滚而下。

此时,他是“犯人”,我是美协工作人员。可是,自始至终,从一起写生到后来他远赴香港,林风眠先生都是令我肃然起敬的大师,就是在看守所里也一样。林先生比我年长39岁,是我的父辈,而且他1928年创建杭州国立艺术院,是我母校浙江美院的前身,我们又有师生之谊,我非常爱戴他。我听着他断断续续的描述,无比同情,心头酸楚,眼眶也红红的,差点落泪。

我继续向林先生介绍了一些其他情况,有美协的,也有社会上的,都是他想知道的。林先生入狱以后,无法读书看报,闭目塞听,外面的很多讯息都不知道。他听我说外面的事情,流露出兴趣,偶尔插一两句话。

除了介绍情况,我想趁看守不在,明确说些话,鼓励他一定要坚持下去,却又语塞,毕竟是晚辈,不太好说。何况,身处“文革”之中,谁又能预测什么时候能结束,下一刻发生什么,以及林先生的命运何时能出现转机呢。

按规定,见面的时间不能长,我看林先生的情绪明显好起来,脸上有了点神采,马上和他商量下一步安排。

我说:“沈先生这次不能来看您,他没办

法。但他很想念您,大家都想您,惦记着您。我们想找个借口,把您带出来,见一下面,您可愿意?”

他说:“好!”

我接着说:“只是要委屈您,要以批斗为借口。”

林先生回答:“好。”表示不介意,言简意赅,不啰嗦。又恢复成了我以前熟悉的样子。我总是意犹未尽,想再多说几句安慰的话,奈何时间过得飞快。看守进门,催促我们离开。我匆匆结束和林先生的见面,急于回去向沈柔坚汇报,及安排林先生出来见面的事情。

临出门,我再回头看看林先生的样子,心里又一阵难过。

走出接待室,我谢过狱警,简单寒暄两句,想多了解些看守所的情况。我说:“你们就给关押的人吃两顿饭啊?”那个狱警比较粗鲁,大概在这种专政地方待的,说话很不客气。他答:“吃那么多干嘛?整天关在里头,又不做事。吃两顿够了,上午十点,下午四点。”我特意又去看了看看守所的厨房,看到林先生他们用的餐具。一个圆形饭盆,中间隔开,分成两个月牙形空间,一边盛饭,一边放菜。厨房里一口大锅正在做菜,师傅胡乱搅拌,马马虎虎,油盐不均,有的菜叶都没完全烧熟。我心想,老年人的肠胃怎么受得了。

这次见面时间有限,没有当面向林先生入狱的原因,后来便再没机会听他亲口说明。多年间,关于林风眠先生入狱的背景较少听到一个准确详尽的说法,有的是道听途说,

有的是以讹传讹,并不确切。我知道的是,他问题的源头在北京,当时他的案子由北京的专案组负责,几次提审他,也是北京来人。

一场非常特别的“批斗会”

我回来后,向沈柔坚汇报了林先生的狱中情况。沈柔坚一阵伤感,片刻后,才叹一口气。他很心疼古稀之年的这位老友。我向前走一步,问他:“你想见见林先生吗?”

沈柔坚答:“想啊,有啥办法吗?”

因为之前我已经和林先生通过气,有了默契,便说:“得再开一张介绍信。林风眠是美协的副主席,知名画家,有些问题只有他清楚,我们找这个借口,说要揭发批斗他一下,就能把林先生带出来,大家见上面。”

沈柔坚觉得主意好,很动心。我去看守所探监的成功,增加了他对后续安排的乐观。只是他还有

两点忧虑:怕林先生不同意,又担心看守所那边能否放人?

我说:“林先生那边已经说好,他同意的。看守所应该也不会有问题。”

沈柔坚见我说得把握十足,马上让我接着去办。我入职美协后,一直在沈柔坚、蔡振华身边工作,办过不少具体事务。他比较信任我,有些事情喜欢找我帮忙,一般他交代完事情,不用说我具体方法,我总能办好,他对我放心,对我的办事能力放心。

我一边安排召开所谓批斗林风眠的会议,一边策划去看看守所接人。这时,美协里有几个人知道我去探监林风眠的事情了,他们



林风眠(绘画者)出狱后参加的一次赛画会,据说是他离开上海前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。左一为胡振郎

真相推理师:擅变

呼延云



37.另有其人

呼延云说:“结果一进病房,王军就傻了,昏睡中的陈丹,根本不可能想见他,他本能地意识到有人想陷害他,于是拔刀在手,结果被潘秀丽误以为他要杀人。”

“在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,我开始重新审视整个案件,发现越来越多的疑点。”呼延云紧蹙眉头说,“比如,莱特小镇是王军杀害芬妮的地方,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残害陈丹,并打电话引起警方的注意,这不是引火烧身吗?再比如,陈丹案现场发现的那根大腿骨,后来被证明是芬妮的。凶手如果是想吓唬陈丹,用其他动物的骨头就行了,也方便得多,为什么偏偏要把芬妮的大腿骨放在现场呢?这一切一切,都有某种‘刻意’的气氛。对,就是这两个字——刻意!直到我阅读‘通辽河北岸无名女尸案’的卷宗,才找到答案,卷宗上记录着:在发现芬妮尸体的那个土丘上,发现了三趟足迹,其中,第一趟和第二趟是同一个人的,第三趟的步态特征和前两趟虽然相仿,但出现了擦挑痕,这是小脚穿大鞋的表现。思缈,是不是这样?”刘思缈点了点头。

“可贵的是,思缈在附于卷宗后面的纸上写下了自己的怀疑:第一趟足迹是寻找埋尸位置时留下的,第二趟足迹是实施埋尸行为时留下的,那凶手为什么还要走第三趟?他应该从此远离埋尸地点,避免嫌疑才好啊!”说到这里,呼延云一声长叹,“思缈啊思缈,你已经想到这个份儿上了,为什么就不能再想一步,答案就在眼前:第三趟足迹当然是某个人从装碎尸的袋子里拿走芬妮的大腿,并放下火柴盒时留下的啊……”

“啊?”刘思缈惊讶地瞪圆了眼睛,“他为什么要这么做?”“我先问你个问题。”呼延云说,“他为什么每次作案,都要放下一个火柴盒?”这个问题,林香茗替刘思缈回答了:“1号凶嫌属于有组织力罪犯,放下火柴盒,通过火柴盒里每根火柴的燃烧程度,来提示警方:他还要继续杀人!”

“香茗,你只说对了一半。”呼延云说,“他放下火柴盒,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,那就是让我们把每一起案子都‘串连’起来,以为这些案子都是同一个人做的,是一起系列杀人案。把芬妮的大腿骨放在陈丹被割乳的现场,也是这个目的。后来警方发现装有芬妮的碎尸的袋子,不是马上就和陈丹割乳的案子并案了吗?当我们在作为‘临时居所’的20号别墅,发现电锯上有芬妮的骨屑,不是想当然地就认为陈丹的案子也破获了吗?”

林香茗说:“那么,你的结论是?”呼延云慢慢地说:“土丘上的那个擦挑痕,虽然很微小,却让我看到了另外一个身影。我隐隐约约感觉到:真正的1号凶嫌并不是王军——更精确地说,并不是王军一个人。王军杀死并掩埋了芬妮,后来又杀害了娟子,这些确实是他干的。但是从土丘挖去大腿,在犯罪现场放下火柴盒,残害陈丹的却是另外一个人。这个人在背后,像鬼魅一样时隐时现,他才是陈丹案件的真正策划者、实施者和操纵者。他用火柴盒、用大腿骨,甚至故意用左手割下陈丹的乳房,刻意地把我们的视线引向王军,引向徐诚集团,而我们——甚至王军,都确实确实像木偶一样,被他牵着走。无论是香茗的误闯贰号公馆险些被罢官,还是小郭的推理直指王军是真凶,都是这个鬼魅在作祟!”

刘思缈叹了口气:“真没想到,这个案子竟会这样复杂。”“确实,这个案子是我遇到过的最复杂、最棘手的案件之一。”呼延云的口吻,平静中藏着一丝感伤,“坦白地讲,如果真正的1号凶嫌在割掉陈丹的乳房后,就此住手,那么我真的束手无策,但是后来他杀死了陈丹——恰恰就是他杀死陈丹的过程,让我看清了他的真面目!”所有人的目光中都充满了惊异。

“破解案子的关键,就在郭小芬的那句话中——‘凶手杀死了人,进入一个空无一人的房间,他的目的无非两个:或者是拿走什么,或者是放下什么。’”呼延云的声音凝重,“当小郭从花中找到窃听器的时候,我们都以为凶手进入112,是为了拿走窃听器,但是我刚才已经推理过了,恰恰因为有个窃听器,恰恰因为徐诚集团能听见我和于护士长关于陈丹生命垂危的对话,他们不会派人来杀陈丹。这就把一个问题再次推到了我们面前:凶手在紧张的杀人过程中,跑到112房间去做什么?”

2.立足老城厢

此时,田家阿叔已有了儿子田国川和不足三岁的女儿田金玲(即宣景琳)。但阿叔染病在身,贩报已力不从心了,在几个报章中他还是欢喜小毛,就把一两家报馆的发行人介绍给他;加之小毛在茶馆卖报也认识两家报馆的发行经理,订报的老客户又比较熟悉,便做起了报贩生意。小毛的收入上了一个台阶,他从昔日穿街走巷一张张卖报送报开始一捆捆买进卖出了。蒋仲英在上海终于立牢脚跟,且在老城厢租了房子。喝水不忘掘井人,他与田家阿叔时有往来。

蒋仲英又穿上长衫了。手头有了几个钱,他闲时喜欢去茶馆品茗,去“楼外楼”屋顶花园听林步青的苏滩,听弹词。上海开埠,加上太平天国战争,江南一带世家大族,地主官僚纷纷逃往上海,也带来了他们的娱乐方式。为适应这些移民的文化需要,茶楼、戏馆、书场日益出现。蒋仲英因做报章,经常去茶楼卖报,所以对老城厢和四马路(今福州路)、石路(今福建路)一带的茶楼很熟悉。他常去的茶楼书场有位于邑庙之北首的得意楼书场、九曲桥畔的“怡情楼”和北首的柴行书场,由张金毛于光绪十四年创办的上海最早的专业书场——玉茗楼书场也每去光顾。蒋仲英还爱看京戏。书场落回休息,有一两个戏馆的“案目”,会在听客中向戏迷介绍,某戏馆于某月某日将特邀某某京剧名角来沪献艺的消息。早期戏馆的戏票由“案目”包揽代销。所谓“案目”即戏票推销员,是照应案边看客的头目。因为那时戏馆的大厅里只设方桌座椅,“案目”们按占据方桌的数目,先给戏馆老板交一笔钱款,名曰“押具”,老板根据“押具”多寡分配方桌,押款多者,方桌居前居中,押款少者,方桌居后居偏;有钱的大“案目”则可以大包大揽,然后向看客兜售戏票,从中谋利。达官贵人,送票上门,看完戏再上门索款;一般看客可在看戏之日在戏馆门口向“案目”取票付款进场。

一日,17岁的蒋仲英去位于石路(今福建中路近广东路一段)满庭芳茶园旧址的天仙茶园看戏。走进戏馆,他看见台前几张

方桌上摆满果盆子,除了时令鲜果,还有花生、瓜子、杨梅干、各式糖果、糕点,供看客消闲享用。方桌边坐着几个嗑瓜子聊天的女眷,是他熟悉的太太小姐,便走上前去招呼。

那天的戏很好看,是王洪寿主演的连台本武戏《铁公鸡》,台上卖力,台下掌声,叫好声不绝于耳。戏馆四周柱子边上都有不少人站着观看,生意火爆。蒋仲英的脑子转开了:

上海人如此爱看京戏,做“案目”一定有赚头啊,我何不试试?在书场上,他听两个做“案目”的阿叔讲,做这个行当赚的是戏票钱,主要是赚水角、糕点上的外快。只要有好戏及时通告,送票上门,侍候周到,大户人家是不吝酬金的。

蒋仲英这几年贩报,克勤克俭,积攒了一点铜钿。因为送报上门,他认识一些大户人家的老爷太太和少爷小姐,都知道他叫小毛,推销戏票当不成问题。他决定先包一两张方桌的戏票试试。一个做“案目”的阿叔知道小毛的想法,蛮帮忙,先介绍他见了丹桂月记茶园的老

老板夏月珊。夏月珊是有“活马超”之称的京剧艺人夏奎章的儿子,习文武老生及文丑,擅演《独木关》、《定军山》。因为长期在沪演出,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,致力于京剧改良运动,排演过不少时事新戏。夏为人豪爽,见小毛伶俐干练,欲做“案目”,便一口答应,还让他第一次免交“押具”,给他十几张戏票。小毛受此恩惠,拳拳不忘,从此,蒋仲英一直跟随夏月珊“天仙月记”班底做“案目”。

其时,夏月珊、夏月润兄弟和潘月樵领导的京剧班底,正在位于宝善街近大新街口(今之广东路近湖北路安旅社以北一段)老丹桂茶园的原址天成茶园演出夏月珊的《定军山》、潘月樵的《扫雪打碗》与《乌龙院》。蒋仲英手头靠台前的两桌16张票子,因为他脚头勤、嘴巴甜、人头熟,很快就送上了公馆府邸。小毛接待殷勤,客人非常满意。隔了数日,小毛上门取款,还拿了酬金,十分顺利。他当即付清了欠账的戏馆票钱。小毛有了底气,“案目”越做越大,包揽的桌面也越来越多,蒋小毛做“案目”开始出名了。“要看戏,找小毛”,成了一班戏迷朋友的口头禅。

皓月涌泉

唐燕能

